



王朔和海岩的文学选择： 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机制

Literary Choices of Wangshuo and Haiyan:
the Mechanism of Popular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赖洪波/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Literary Choices of Wangshuo and Haiyan:
the Mechanism of Popular Cultural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王朔和海岩的文学选择：

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机制

赖洪波/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王朔和海岩的文学选择：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机制/赖洪波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5039 - 3674 - 6

I. 王… II. 赖… III. 群众文化—影响—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7587 号

王朔和海岩的文学选择：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机制

著 者：赖洪波

责任编辑：郑向前

装帧设计：青 青

出版发行：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10

网 址：www.whyscbs.com

电子信箱：whysbooks@263.net

电 话：(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6.625

开 本：880 × 1230 1/32

字 数：210 千字

书 号：ISBN 978 - 7 - 5039 - 3674 - 6/I · 1655

定 价：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序：让我们理解时代的变化

张颐武

赖洪波的这部著作是她的博士论文的修订和扩展的成果，是她在北京大学三年博士生生活的一个总结。在博士答辩中，赖洪波的论文受到了答辩委员会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扎实和认真的成果。根据老师们提出的问题和修改意见，在本书出版时赖洪波又进行了修改和扩展，使之更加完备和成熟。今天论文以图书的形式和读者见面，值得祝贺。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赖洪波一直努力地在当代文学的学术领域中默默地探究和思考，在打好基础的同时也不断地尝试开拓学术领域，克服了许多困难，无论在理论的思考或者具体的问题的探索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终于获得了这样的成果。作为她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我感到欣慰，愿意在这里表达我的一点意见。

这部著作是通过对王朔和海岩两位自“新时期”以来对于中国的文学写作和大众文化有重要影响的作家的全面研究来探索当代文化的转变的。王朔和海岩两位作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跨出了传统的“文学”的边界的作家。他们都具有多重的身份：既是在小说和影视多方面拓展、不断引起轰动效应的公众人物，又是在文学领域中开拓新的领域和空间的人物。他们的这种特性其实凸显了他们不仅仅是文学领域内的人物，而且还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的、对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转化起到重要作用的作家。

这两个作家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自己的文学写作。在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中国文学还仅仅是一个“统一”的文学界，还没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而且正是文学成为社会的中

心，受到极大关注的时代。同时，这也是中国价值观和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一面是中国内部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中国的市场化刚刚开始初露踪迹；而另一面是中国开始了开放的进程，和西方建立新的关系。而中国的大众文化也在悄然崛起。他们投入了文学领域，当然可能是受到当时文学的中心位置的吸引，但他们却正好风云际会，通过自己的写作打开了文学的新的天地。他们都突破了原有文学的框架，将文学和当时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打通”，为中国的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当年王朔的《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一系列小说和海岩的《便衣警察》都是建立了新的文学意识的作品。他们当时的这些作品其实是在文学领域中感受到了正在兴起的大众文化的冲击，并对此有了应和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还有“新时期”的启蒙意识，但已经有了新的视野和风格。王朔是在文学界内部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作家，以独特的语言和对于剧烈变动的社会的新的观察，表现了在计划经济传统已经开始溃败的时代，一种从中游离出去的新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是方生未死的经验，是旧的秩序开始变化的象征。王朔的这些小说所写出的“边缘人”已经脱离了计划经济控制的刻板生活。对于这种脱离也许还充满了不安和忏悔，但他们其实已经回不去了，他们正在开启一个新的天地。王朔早期的小说写的都是一种互相吸引。男主人公往往是从计划经济中游离出来的人，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单纯，他们非常迷恋还在体制内的单纯和美好的女性。通过这种迷恋其实是给自己在不确定的新生活中一个确定的位置。而仍然生活在计划经济的秩序中的女主人公则对于这些男主人公所代表的新的体验充满兴趣，受到强烈的吸引，她们通过这些男性感受到了新的活力和生机。这类小说模式几乎是王朔早期小说中最受欢迎的小说模式。

海岩的作品则以《便衣警察》精彩地为类型小说打开了空间。在他之前，虽然也有类型小说的形态，但由于文学界的未分化而并没有这样的文类自觉。海岩可以说是第一个自觉开创了类型小说的作家。《便衣警察》改编为电视剧的巨大成功开创了海岩小说的持

续地流行。而海岩也以情感和犯罪作为自己小说的两大支柱而创造了中国小说的一种独特的新的类型。这种类型也是以电视剧的流行为基础的。这种新的类型是中国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代的社会形态的投射，人们感情生活的剧烈变化当然是社会变化的中心，而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化相联系的犯罪也是引起关注的重点，海岩的小说必然投射了社会的变动的轨迹。到了90年代，王朔也突入了大众文化领域，《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都打开了大众文化的新的空间，也为90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提供了新的文化资源。而王朔始终受到文学界的高度关注，因为他可以说是从正统的文学界突入到大众文化的代表人物而激发了巨大的争议和持续的讨论，海岩则与此不同，文学界对于他的作品始终缺乏，他是依靠作品的流行而受到读者和电视剧观众的关注的。

此后他们的写作风格一直持续下来，直到今天。他们在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的同时也确立了一个新的边界。他们一面是将文学和大众文化勾连起来，另一面却也划定了纯文学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王朔近期的写作已经走向了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对于自己的生命的极限性的思考，而海岩则持续着自己的写作。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在30年中国的历史中，他们都留下了重要的一笔。他们的工作是我们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他们在我们面对的一个关键的时代中为我们心灵的发展提供了滋养。

赖洪波的这部书对于这两个作家的精神轨迹、创作道路和写作状态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在比较中凸显了不同的特色和相似的贡献。这部书的研究是扎实严谨的，也是富于创造性的。这部书不仅让我们理解两个作家，也让我们理解我们处身其中的时代的变化。

是为序。

目 录

序：让我们理解时代的变化	张颐武 1
绪论	1
第一章 社会转型与文学观念的嬗变	19
第一节 徘徊在“雅”与“俗”之间的“文坛个体户”	21
第二节 对海岩文学观念的简析	33
第二章 “大众文化”生产机制中的王朔与海岩	45
第一节 出版机制的改革与《王朔文集》	45
第二节 王朔与中国电视剧的“本土化”	52
第三节 “海岩剧”与海岩小说的畅销	61
第三章 从“主体”到“个人”的犹疑	70
第一节 被拯救的“个人”——对王朔言情类小说中 “顽主”形象的分析	70
第二节 语言的乌托邦与商品化——对王朔戏谑类小说中 语言的分析	85
第三节 《便衣警察》：“大众文化”中的“主体”想象	100
第四章 大众文化想象对国家与个人关系的重构	120
第一节 女警察的爱情：对一种叙事模式的考察	121
第二节 爱情悲剧与“个人”的凸显	132
第三节 “女儿”与“父亲”：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	139

第五章 大众文化想象对“日常生活”的重构	145
第一节 新世纪以来海岩小说的叙事结构	145
第二节 孤绝的个人与欲望化的都市	148
第三节 现代都市中的疾病与金钱意识形态	157
第四节 中产阶级空间的展示与对底层的新想象	163
第五节 性格决定命运的“神话”	169
第六章 文学与商业的对立：知识分子关于“王朔现象” 的论争	175
第一节 划分“雅”与“俗”的话语论争	175
第二节 “人文精神”论争与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层	181
结语	191
参考文献	194
后记	202

绪 论

一、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的确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促使中国文化市场的形成。在文化市场上，文化的商品化成为越来越明晰的社会现实。而文化的商品化在90年代以来的文化领域带来的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就是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蓬勃发展。那么，在“市场化”原则主导下的“大众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机制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是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

为了便于论述，本书选择王朔与海岩两位作家作为个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选择王朔和海岩两位作家作为个案来讨论“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机制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大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机制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初步形成、到90年代迅速发展和确立的过程。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文坛引发很大争议的“王朔现象”无疑是呈现社会转型期间文学生产与消费机制发生转变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表征。“王朔现象”包含着社会“市场化”转型给文学带来的许多冲击，它迫使人们对一些关于文学的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如究竟什么是“文学”？“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功能？在大众传媒发达的时代里，“文学”

与影视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面对“大众文化”的兴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王朔的“文学”观念里，现代性制度中的文学丧失了其神圣与尊严，成为逗人一笑的文化商品，作家也成为“码字的”……但是，在王朔的写作中，一直存在着某种叛逆的独特因素使他与“大众文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姑且不提他的小说语言在调侃和反讽中呈现出来的某种文化反叛精神，我们从他在90年代后期以“文化精英”的姿态对“繁荣昌盛”的“大众文化”的大肆攻击中也可以发现王朔与所谓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海岩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坛已经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海岩虽然在80年代末就加入作协，但是他一直称自己在文学领域是“业余的”、“玩票”性质的作家，似乎更愿意以商人的身份^①来谈论自己的创作。海岩的创作一直与电视剧这一“大众文化”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海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便衣警察》。该小说很快由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和公安部政治部联合录制成12集的电视连续剧并于1987年播出。这部电视剧引起了轰动效应，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一个经典文本。《便衣警察》的成功改编也成为海岩的文学作品与电视剧“联姻”并获“双赢”的“海岩效应”的肇始。90年代初海岩发表了小说《一场风花雪夜的事》（1994）。由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成功地确立了“海岩剧”精致唯美的风格。此后，海岩连续发表了《永不瞑目》（1998）、《你的生命如此多情》（1999）、《玉观音》（2000）、《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2001）、《平淡生活》（2001）、《深牢大狱》（2003）、《河流如血》（2004）几部长篇小说，且每一部小说都被改编成电视剧并取得较高收视率，

^① 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就加入作协，但海岩似乎更愿意强调自己的“商人”身份。他在商界的职务有：锦江（集团）副总裁、锦江（北方）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昆仑饭店董事长和中国旅游饭店协会会长等。

这一系列的成功使得“海岩剧”在影视圈成为一个响当当的电视剧“品牌”。

海岩 90 年代以来在文化市场上的成功为我们研究“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机制中的文学写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个案。与王朔小说透露出来的语言特色和反讽的精神不同，海岩的写作呈现出比较固定的“案情+爱情”叙事模式；作为一个“业余作家”，海岩却保持着每年 80 万字左右的发稿量，平均每天的写作量为三四千字，其写作速度是惊人的；海岩用自己的剧本作为投资的资本介入电视剧的制作过程，开启了一种新的电视剧制作模式……如果说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王朔的文学观念、写作姿态以及对影视生产的介入体现了社会“市场化”转型时期“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机制对作家写作的影响，那么，海岩在 90 年代以来的文学观念、写作方式和对电视剧生产的深入介入则表现了逐渐成熟的“大众文化”生产与消费机制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制约和互动。王朔与海岩的文学创作及其“大众文化”实践活动，为我们勾勒出“大众文化”逐渐兴起到发展壮大一个运动轨迹，也为我们认识社会“市场化”转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典型的个案。

其次，王朔与海岩在文坛的不同“遭遇”为我们考察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来“文学场”的结构变化提供了一个切入点。90 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兴起对“精英文化”造成巨大冲击。90 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可以看作是知识分子对迅速发展的“大众文化”的一次集体回应。王朔的作品和他对“大众文化”的积极参与的姿态是引发“人文精神”论争的重要因素之一，王朔本人也成为这次论争的一个靶的。知识分子对王朔的论争显示了在社会转型期间知识分子内部对待正在崛起的“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王朔的文学作品介乎“雅”与“俗”之间，模糊了“文学场”内部“严肃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的界线，由此激发知识分子对“文学”的定义和功能进行论争。这些论争表明了知识分子对“文学场”内象征性权力的争夺。王朔的作品和“大众文化”实践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引起“文学场”内的论争表明，他的作品和文化实践在社会转型期间所具有的象征力量。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一件文学作品如何被接受及评鉴可成为社区中不同区位成员间的论争。当然，并不是每一件文学作品都会引起文化论争及象征性权力论争——绝大多数的作品都不会引起这样的后果。根据第麦久的说法，一个文化产品若逾越了文化区隔间的分界线（高级文化/通俗文化）而引起强烈的反感，那它就具有象征力量或是仪式力量。”^① 王朔的存在使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处于社会转型期间的文坛不断进行划清“雅”与“俗”界限的工作。随着“大众文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成为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存在，这种划清界限的工作也逐渐停止。90 年代后期海岩的写作和“大众文化”实践在文化市场上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学术界只是把他的写作归类于“商业写作”而不予更多的关注。王朔与海岩在“文学场”内的不同“遭遇”，显示出 80、90 年代以来“文学场”的组织结构发生的重大改变。

再次，王朔与海岩两位作家的文学生产与影视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为我们认识大众传媒对文学生产的影响提供了两个比较典型的个案。一方面，两位作家对影视生产的介入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学生产也对影视生产尤其是对电视剧这一“大众文化”形式的“本土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朔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参与了《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等电视剧的制作，对 90 年代以来电视剧的娱乐化、本土化影响深远。我们从活跃在影视舞台上的导演冯小刚、郑晓龙、赵宝刚等的影视制作中都可以看到王朔风格的影响。90 年代中期以来，电视剧呈现出多元化、娱乐化的发展格局，也出现了多种制作模式，如以央视为依托、以制片人张纪中为中心的内地武侠片的大制作；而以导演李少红为中心，集投资、制作、发行于一体的电视剧生

^① 林芳玫：《解读琼瑶的爱情王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 年，第 29 页。

产模式创造了婉约诗意的电视剧风格；以编剧海岩为中心的电视剧制作模式则创造了唯美精致的都市言情偶像剧，等等。这些不同的电视剧制作模式的出现，体现了中国电视剧“本土化”的逐渐成熟。王朔和海岩在影视领域尤其是电视剧“本土化”生产上取得的突出成绩，为我们考察90年代以来电视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演变提供了两个典型的个案。

最后，在当前中国的“大众文化”蓬勃发展、文化商品多元化的消费社会中，王朔与海岩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文化想象为我们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对国家、个人、性别、阶级等方面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一个着眼点。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可以说，90年代以来，正是大众文化在完成着关于中国社会阶级分层、性别秩序、民族想象等关键方面的意识形态构造。如果不分析大众文化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内容，便难以理解90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也将伴随着80-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而完成的意识形态构造，充分地合法化了。”^①当我们考察80、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作用时，王朔与海岩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极好的着眼点。王朔与海岩的创作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他们的作品都以北京年轻人为主人公，北京的都市生活是他们作品的共同背景。但是，80年代末王朔笔下出现的是带有某种文化叛逆精神的北京“痞子”，而在海岩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这些“痞子”在全球化、市场化的大都市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海岩编织的“言情”幻梦背后，活跃的是90年代后期在充分市场化的都市生活中必须自我奋斗、自我负责的“白领”青年。王朔与海岩的写作反映了十余年来中国城市生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变迁。但是，我们仅仅从“反映”的观点来看待王朔与海岩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变化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文学和文化中的“虚构”，往往会成为

^① 贺桂梅：《“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研究的实践和可能性》，见“左岸网”<http://www.eduww.com/lilc/go.asp?id=4102>。

我们展开关于“国家”、“历史”与“自我”的文化想象的开始，这些“虚构”是填充一个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的开篇就指出：“我更是借此书强调小说之类的虚构模式，往往是我们想象、叙述‘中国’的开端。国家的建立与成长，少不了鲜血兵戎和常态的政治律动。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① 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们在考察“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建构作用时，仅仅关注文学制度对它的生产上的制约与规范作用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仅仅关注文学制度对文学的组织和规约的过程，可能会忽略文学作品特有的情感、梦想、迷狂、乌托邦乃至集体无意识的力量，而这些元素并非总可以通过制度的规约加以说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文学会反过来生产和转化为制度实践。”^② 可见，在文学的制度生产和文本的意识形态生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因此，本书在考察80、90年代文化生产与消费机制对王朔和海岩文学创作的影响时，同样也关注他们在文本中进行的意识形态生产，以此来讨论80年代以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的重大变化。

王朔与海岩的“大众文化”实践，一方面，为我们勾勒了中国本土“大众文化”发展的较为清晰的运动轨迹，为大陆“大众文化”的本土化提供了多样的文化经验；另一方面，王朔和海岩所提供的文化想象，为我们考察80、90年代以来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提供了切入点。在80、90年代社会转型的语境中，王朔和海岩的作品，体现了文学作为商品和意义符号的双重地位，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不同的阐释者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他们文本的意义。而

^① 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页。

^② 李杨：《50年代—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7页。

当他们的作品经过改编，成为流行的影视作品时，文本的意义不断地在流通与消费的过程中发生变异，如由王朔作品改编而成的电影，显示出许多与小说不同的风格；海岩 90 年代以来的小说则经过改编，塑造了一种风格鲜明的“都市言情”电视剧类型，展现出被人们称为“爱情+案情”的固定模式，显示了文本意义在市场、影视媒介、读者与观众的共同作用下对意识形态的建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中国“大众文化”经历了从 80 年代末兴起、引起争议，到 90 年代后期“大众文化”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形成、占领文化领域的优势地位的扩张历程。王朔与海岩，既是这一场“文化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极有代表性的见证者。

二、“大众文化”：一个不断延伸的概念

“大众文化”是本书涉及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展开具体的讨论之前，需要对这一概念做一些简要的说明。

首先，本书中所使用的“大众文化”，大致是指中国 8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而形成的一种现代都市消费文化，它与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文化市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粗略的定义参照了西方学术话语中“大众文化”的概念，同时也吸取了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本土”“大众文化”的研究成果。下面对这两方面的学术资源做一些简要的介绍。

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大众文化”这一术语背后纠结了庞大和复杂的话语背景和思想脉络。早期的“大众文化”对应的译文是“Mass culture”，这一概念包含着被文化精英所鄙视的“无知、庸俗、偏见、冲动、非理性”等贬义色彩：“当时，‘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是相对于高等文化（High culture）而言，它被精英们提炼出来，用来指称当时正在凸现的与传统的高等文化不同的文化现象，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正处于上升，资产阶级新贵们的市侩之气，下层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文化精英看来，都在破坏传统的社会秩序与

人际关系。‘大众’包含着无知、庸俗、偏见、冲动、非理性的意思，‘大众文化’自然是对这个阶层粗俗文化状态的贬称。”^① 因此，对“大众文化”的讨论应该追溯到 19 世纪后半叶的“大众社会”的形成。而“探寻大众社会这个概念的起源，必须上溯 19 世纪后半叶，西欧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当时，工业化带动了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诸般条件，有利于现代阶级社会的形成，其社会基础已经不再是‘人们’（people），而是‘大众’”。^② 可见，在西方，“大众社会”的形成是 19 世纪后期西欧快速工业化的结果。托克维尔、尼采、艾略特、加塞特等知识分子最早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大众社会”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于这些批评，有论者这样评论道：“最初提出大众社会理论的人，其政治意图在于捍卫统治阶级（贵族或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他们企图压制中下层民众追求民主的精神，他们重新伸张死板而僵硬之社会阶层的必要性，他们想让精英阶层稳固地掌握决策权，永远享有特权。诸如此类的社会理论，实际上等于排斥了资产阶级的哲学观，他们并没有遵守依民主而行政的原则；如果依照这些理论的说法，资产阶级催生的革命性作用，无非是在文化与社会生活上，带来了平庸与陈腐罢了。”^③ “大众文化”被认为是“大众社会”的必然产物，作为工业化的结果，它“被认为是抹杀个性，推广平庸，导致趣味、习惯、观念甚至行为千篇一律，个人的差异，社会阶级的差异，大有给一笔勾销的趋势”。^④ 20 世纪 30、4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

① 扈海鹏：《解读大众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40 - 41 页。

② [英] 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2 页、3 页。

③ [英] 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第 4 页。

④ 陆扬：《大众文化面面观》。见《大众文化研究·代前言》，陆扬、王毅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 页。

大众文化进行了强烈的批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其《启蒙辩证法》中提出“文化工业”一词批判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和对受众的欺骗性：“文化工业引以自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东西，并使其成为一项原则，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种商品类型。”“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康德的形式主义还依然期待个人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人完全可以在各式各样的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之间建立一定的联系；然而，工业却剥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①

在英语国家，19世纪后期马修·阿诺德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20世纪上半叶利维斯基本延续了阿诺德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思想。他们坚信：真正的文化是少数人的专利。利维斯对“精英文化”在20世纪以来受到“大众文化”的冲击深感忧虑，开启了“大众文化”批判中的利维斯主义。20世纪20、30年代，工业技术的发展使大众文化与新的传播媒介紧密联系起来；在20世纪30、40年代，“Popular culture”这一比较中性的词汇开始逐渐代替包含贬义色彩的“Mass culture”成为流行语。雷蒙·威廉斯和里查德·霍加特等一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的学者开始对“文化”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认为文化不仅指一种经典的精英文化，而且指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尤其关注当代文化中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研究，对“文化研究”范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化研究”范式中，“大众文化”研究借助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资源，其中，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为“大众文化”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因为从葛兰西的理论视角来看，“大众文化既是支配的，又是对抗的，它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获得霸权的努力和被统治

^①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1页、139页。